



崔海亮
著

廖平今古学研究

廖平的今古学包括学术史意义上的今古学与政治思想意义上的今古学两层含义。就学术史意义上的今古学来说，本书主要通过对照廖平的《今古学考》与《古学考》的分析，揭示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学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对经学史上的今古学问题重新认识。就政治思想意义上的今古学来说，本书主要通过对照《知圣篇》与《地球新义》的分析，揭示廖平在当时中西冲突的背景下对制度思考的积极意义，试图做到“了解之同情”。

岳麓书社

青年学术文库

Youth academic library



廖平今古学研究

崔海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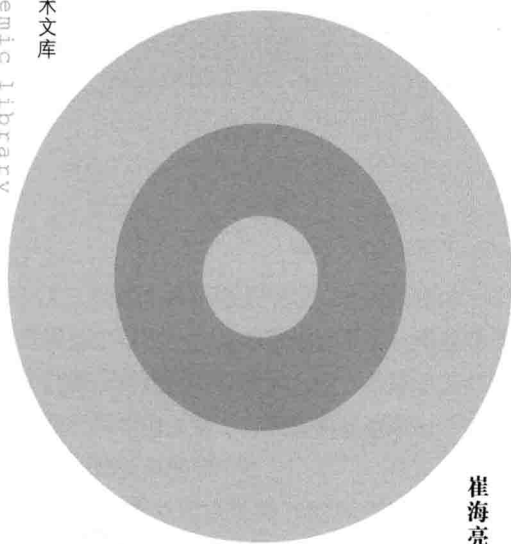
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岳麓书社·长沙



青年学术文库

YOUTH ACADEMIC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廖平今古学研究/崔海亮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4. 2

ISBN 978-7-5538-0249-7

I. ①廖... II. ①崔...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

IV. ①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7562 号

LIAOPING JINGUXUE YANJIU

廖平今古学研究

作 者:崔海亮

责任编辑:刘 文(投稿邮箱:canghai5000@163.com)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萧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http://lzfts.tmall.com

201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1.5

字数:309 千字

印数:1—1 500

ISBN 978-7-5538-0249-7/Z·31

定价:29.80 元

承印: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自序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古今中西问题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特别是在晚清民国中西文化冲突的思想背景下，随着经学权威的坠落、道统的逐步打破、封建统治权威的瓦解，传统士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对民族的前途命运不能不深入思考。廖平就是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学者。

廖平被冯友兰先生称为“经学时代之结束”的标志性人物。他一生的学术思想先后经过六次比较大的变化。在动荡的时局和西学强势冲击的时代背景下，廖平经学也不断改变，力图从传统经典中找到可以挽救时局的思想资源。虽然廖平在学术上的探索最终失败了，但是他的经学思想以及学术探索背后的政治思想却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廖平的《今古学考》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今的一些经学史著作仍然沿用他在《今古学考》中提出的“以礼制平分今古”的思想。但是廖平提出的“以礼制平分今古”的观点是不是可靠？他的“今古学”到底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廖平学术探索的背后还蕴含着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还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

本书以“廖平今古学研究”作为题目，即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对廖平“今古学”的学术史意义和政治思想意义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

从中国近百年历史来反观廖平的经学思想，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廖平经学理论建构的意义之所在。廖平一生的学术探索在于以“沟通中西”来达到“尊经尊孔”的目的。他主张保持中学的主体地位，用西学来辅助补充中学。在此前提下，通过中外汇通，实现传统经学的现代转化。在《孔经哲学发微》中，廖平以西方词语“哲学”来替换“经学”，也体现了廖平想把经学纳入现代西方学术体系的一种思考。虽然廖平的“沟通中西”并未成功，但其理论建构并非没有意义。特别是在民族文化向传统回归的今天，廖平的经学思想更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传统经学在当今已不存在，但“经学传统”仍在延续。新文化运动以来，对经学和经学史的研究从来就没有中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学研究出现复苏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简的面世，更引发了学者对经典研究的热潮。姜广辉、彭林、严正等学者编撰了一些经学研究的论著和论文。进入21世纪，经学研究进一步升温。2005年11月，在清华大学召开了“首届中国经学学术研讨会”，2008年9月，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了“经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5月，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中日韩经学国际研讨会”，201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经学：知识与价值学术研讨会”。同时研究生、博士生撰写的有关经学的学位论文不断增多。这些都标明经学研究正在逐渐兴起，回归经学传统，复兴经学已是大势所趋。

当前经学研究的兴起是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后身份认同的需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反思精神文明建设向传统回归的一种心理期待。西方文化可以影响改变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表层的方面，却很难改变渗透到中国人血脉中的心理结构和民族精神内核。“经学传统”是联系广大民众的共同的心理纽带，是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作为

一个大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当今“国学热”、“读经热”的兴起与民间传统文化学术团体的活跃都表明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文化大国的良好开端。这表明一个大的国民在当今的文化竞争中希望以本土的文化资源为根基来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与存在尊严。在当今多元文化共存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对待世界文明，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促使中华民族心理的认同，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本书忝列于中国经学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希望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由于本人学术积累和学识素养还很欠缺，而经学思想史又是一个艰深繁难的研究领域，书中的某些论断难免有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目录

导论	一、“今古之争”问题的缘起	001
	二、“今古之争”与“经史之争”——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的转化	016
	三、论文选题的原因及写作思路	027
第一章	晚清的思想背景与廖平的学术历程	035
	第一节 晚清的思想背景	036
	第二节 廖平的学术历程	055
第二章	“平分今古”与“尊今抑古”	069
	第一节 “平分今古”	069
	第二节 “尊今抑古”	102
第三章	古大今小	123
	第一节 知圣与译经	123
	第二节 “大统”与疆域	142

第四章	“日新不已”与“道器互补”	178
	第一节 由蛮野到文明的进化“历史观”	179
	第二节 由小康到大同的王道世界观	194
第五章	廖平今古学的影响	224
	第一节 廖平今古学在当时的影响	225
	第二节 廖平今古学的传承	230
	第三节 廖平今古学的贡献与局限	262
结语	一、“经学传统”的传承性与断裂性	275
	二、“经学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281
	三、现代“新经学”的萌芽形态及其可能性思考	283
	附录一 近百年廖平研究述评	293
	附录二 关于今古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312
	附录三 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学术活动	344
	后记	346
	主要参考文献	349

导论

在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转化的过程中，廖平被冯友兰先生称为“经学时代之结束”^①的标志性人物。在近代向现代转变的中西冲突的思想背景下，廖平经学不断改变，力图从传统经典中寻找可以资治现实的制度资源。因此，廖平的学术思想不仅在学术史上有独特的地位，其学术背后的政治思想也值得挖掘。廖平作为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晚清民国传统士人对国运民瘼的思考。

廖平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他在《今古学考》中提出的“以礼制平分今古”的思想，因此，以往学界对廖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廖平的学术思想及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本书则把廖平的经学“前三变”划为今古学的范围，认为他的今古学既有学术史意义，又有政治思想意义。廖平的今古学主要针对“今古之争”问题与“中西之争”问题，因此本书对廖平的研究就从“今古之争”开始。

一、“今古之争”问题的缘起

“今古之争”问题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中国思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3页。

想史、政治制度史上值得关注的问题。它本来指的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个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论，也是政治利益的争斗。学术与政治相互交织，使经学领域里的“今古之争”问题显得十分复杂。“今古之争”在中国经学史上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发生在两汉，是因为刘歆争立古文经博士而引起的；第二个时期发生在晚清，是由于廖平的《今古学考》、《古学考》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发行而引起的。这两次争论对学术与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学术而言，两汉的“今古之争”导致了会通今古的郑玄通学的出现，并于魏、晋时期形成“纯粹之古学”。^①而晚清的“今古之争”则推动了传统经学的衰亡，并直接引发了“古史辨”学派的兴起。就政治而言，两汉的“今古之争”催生了王莽新政，而晚清的“今古之争”则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晚清的“今古之争”又与“中西之争”相联系，间接引发了新文化运动。

（一）两汉的“今古之争”

两汉的“今古之争”到底争的是什么？今文学与古文学是否为两个截然对立的学派？学者们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廖平的《今古学考》认为自先秦到两汉一直存在对立的今、古文学两派，今文学十四博士家法相承，道一风同，而古文学专与今文学立异，两派泾渭分明，势同水火。古学与今学相争的目的是助王莽篡汉。钱穆则认为今、古分派自汉宣帝以后才有，今、古学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认为廖平等今文学者的观点是出于门户之见，根本不可信。“今古之争”不过是王官学与民间学的区别，“今古之争”的目的是为了官场

^① 蒙文通、李源澄都认为古文经学兴起于今文经学之后，古学家起初都兼通今学，而纯粹之古学至魏晋才完成。详可参见李源澄：《经学通论》，《李源澄著作集》（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第34页。

利禄。钱穆主张从史学的立场解决经学上的问题。^①

我们认为“今古之争”虽然未必如廖平所说的“势同水火”，但也并非是清代今文学者的主观臆造和门户之见。两汉的今古学虽然未必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学派意识，但客观上却存在学术立场、政治倾向的不同。这些不同在汉代的文献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如东汉荀悦在《申鉴·明事篇》中这样讲：“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真本说。……一源十流，天水违行，而讼者纷如也。”范晔的《后汉书·郑玄列传》说：“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瑰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这些文献比较客观地描述了两汉今古学论争的情况。概括来讲，两汉今古学的争论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在西汉末，汉哀帝时，刘歆为争立《左氏春秋》与《古文尚书》为官学与太常博士进行争论。当时刘歆在内朝秘府总校群书，发现秘府所藏的《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等古文经本比较完善，而当时今文经本经“秦火”后有残缺，就建议哀帝将此四经立于学官。哀帝让刘歆与今文经博士讨论经义。今文博士“不肯置对”，也不同意设立古文经博士。刘歆十分恼火，就写

① 廖平的观点可参见其著作《今古学考》、《古学考》等。钱穆的观点可参见其著作《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国学概论》等。廖平的《今古学考》影响很大。康有为吸收了廖平的观点，以后的“古史辨”学派又沿用康、廖的观点。直到今天的某些学术史著作仍然沿用廖平的基本观点，但是已经有学者开始注意澄清今古学问题，如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路新生：《廖平〈今古学考〉经学思想体系中的几个问题》，《孔孟学报》第76期，1998年；沈文倬：《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礼〉的传授》，《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郝积意：《汉代今、古学的礼制之分——以廖平〈今古学考〉为讨论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卷，第1期，2006年。

了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指责太常博士“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刘歆的激烈言辞引起大司空师丹和太常博士们的怨恨，群起而攻之。尽管哀帝袒护刘歆，认为“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汉书·刘歆传》）！但终因得罪了执政大臣和朝中的多数派，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数年后因病免官。

第二次在东汉光武帝时，建武四年（28），古文经学家、尚书令韩歆上疏，建议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光武帝下诏令公卿、大夫、博士讨论，今文博士范升表示反对，并向光武帝上疏，说明反对设立《费氏易》、《左氏春秋》的理由。古文学家陈元驳斥了范升的意见。陈元与范升相互辩难，多达十余次。最后光武帝将《左氏春秋》立于学官，设置博士。后因遭到今文学家的激烈反对而很快废掉。第二年，朝廷正式确立今文经十四家博士，古文经博士一个也没有。自此以后，终东汉之世，再也没有发生古文经学争立博士的事件。

第三次在东汉章帝时，建初四年（79），汉章帝令儒生会集白虎观，辩论五经同异，章帝亲自裁决。当时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今文学者，古文学者只有贾逵和班固。在会上，今文学者李育以《公羊传》义理质难贾逵，贾逵多次反驳，反复辩论。白虎观会议主题是关于今文《五经》经义同异的讨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今文学存在的问题：一是减省章句，二是“共正经义”。会后章帝命班固将会议的记录文献改写为《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不是经学家解诂的专门著作，它摆脱了今文学“章句烦多”的弊病，就五经同异达成了一些共识，同时也吸收了古学家的一些观点。其内容分为四卷，共四十三篇，集中讨论了汉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是一部钦定的关于封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经学法典。《白虎通义》以今文学经义为主，兼采古文经学，是今、古文经学走向统一的初步成果，为后来郑玄会通今古的通学创造了条件。

第四次在东汉桓帝、灵帝时，东汉王朝逐渐由盛世走向衰败，作为官学的今文经学也逐渐衰落，古文学却兴盛起来，研习《左氏春秋》成为热点，《公羊》学日趋衰微，不断遭到古文学家的批评。在这样的情况下，何休继承了汉初以来公羊学的成果，花了十七年时间，写成《公羊解诂》这样一部公羊学集大成的著作。何休的《公羊解诂》与《春秋繁露》一样，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主要是借助阐释《公羊传》来发挥其政治思想。他自设了一些“条例”，通过这些条例阐发公羊学的微言大义，表明其政治立场。何休著此书的目的在于强调“治世之要务”，力图挽救东汉末年衰败的政局。他揭露了桓、灵之间君权旁落的状况，斥责宦官专政的腐败，主张选贤与能及轻徭薄赋，反对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反映了今文学者改革弊政的愿望。何休为重振公羊学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攻击《左传》与《穀梁》。郑玄针对何休的观点，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为《左传》与《穀梁》辩护。何休见到郑玄所著书叹道：“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二人争论《公羊》、《穀梁》、《左氏》的优劣，主要是民间学术上的讨论，而不是由皇帝主持的在朝廷上的论争，似乎与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何休对公羊学的倡导也不能挽回今文学衰落的趋势，而以古文学为基础的今古兼采的通学日益成为学术的主流。

这四次争论基本体现了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斗争及双方力量发展的此消彼长。第一次争论重点在古文经的来源上，今文家认为古文经乃刘歆改乱旧章，无明确的师承关系。而刘歆认为当时的今文经本有残缺，不如古文经本完善，力图为古文经争得官学地位。刘歆虽未成功，但以后王莽改制时却重用刘歆为国师，王莽自比周公，大力倡导古文经学，改《周官》为《周礼》，并据《周礼》采取了一些政治改革措施。古文经学为王莽篡汉张大了理论旗帜。第二次争论侧重于古文经的内容，焦点问题在于《左传》是否传承了《春秋》的经义。今文学者认为“《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后汉书·范升列

传》),所以《左传》不是传《春秋》之《传》。古学家认为“丘明至贤,亲受孔子”(《后汉书·陈元列传》),所以《左传》直接来源于孔子传授。古学与今学的争论并不否定今学的官学地位,而是反对今学对官学的垄断,试图为古学在官学争得一席之地,获得利禄,提高古学在朝中的影响力。第三次争论侧重比较今、古学的异同优劣。表明了今学进一步衰落,而古学却日益兴盛。斗争双方逐渐吸收对方长处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古学由纯粹的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发展,今学也逐渐摆脱章句烦多的弊病,打破师法家法的藩篱,一人兼习数经,逐渐向通学的方向发展。《白虎通义》就是今、古学初步统一的标志,也表明统治者试图重新整合今、古文经学,平息“今古之争”,为巩固皇权提供理论根据。第四次争论与前三次明显不同的是缺少皇帝的参与,但也不能把这次争论看做是纯粹的学术之争。前面已有说明,何休的《公羊解诂》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是为了解决东汉末的现实问题,是今文学革新精神的体现。《公羊解诂》虽然侧重义理的发挥,但采用的却是古文字训诂的形式,这充分说明了今学试图摆脱自身局限获得新生的意图。但是面对郑玄通学的人室操戈,今学仍是疲于应对。第四次争论可以看做是今文经学无可挽回的失败,也是东汉政权灭亡的征兆。

两汉政权与今文经学的命运息息相关,今学作为官学的意识形态,其理论日益僵化而丧失活力,这种理论支撑起来的政权也很难稳固地统治下去。按照章权才先生的观点,两汉的今文经学主要代表了新兴的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古文经学则适应了世家豪族保守倾向的需要。“世家豪族往往以复古为保守。古史中有许多典章制度,它是世家豪族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所需要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世家豪族的代表把经学以政治学变为史学,就是要用比较稳

定和比较保守的说教，来代替今文学家那种比较激进的说教。”^①章权才先生的观点固然可以说明两汉经学的演变，但是学术派别是否必然与特定的阶级相联系仍然值得推敲。今文学官学地位的确立主要是因为它适应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时代要求，为汉朝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作了论证。同时今文学又提出了限制君权的基本主张，如“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汉书·刘向传》）、“天人感应”、“禅让”、“革命”等限制君权过度膨胀的理论，以天命神权来限制君权，尽可能使统治者考虑到中小地主和平民的利益，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公正与政治稳定。今文学限制君权的干政议政、规劝君主的理论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古文学本来是民间的学术派别，但经刘歆提倡后，东汉的历代皇帝对古文经学都十分偏爱与重视。如光武帝时对《左传》的争论，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皇帝直接介入了学术之争，这种争论就具有了政治意味。就统治者而言，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学派意识，不论是今文学还是古文学，只要有利于其统治，他们就都采用。东汉皇帝对古文学进行扶持，一方面是因为今文学日益僵化，而且其革命、禅让^②等限制君权的理论在主观上并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同，所以扶持古文学可以牵制今文学的势力，为君权的膨胀提供一个可能的空间。另一方面，东汉皇帝虽然没有明确的学派意识，但却有着清醒的阶级意识，无疑他是代表和维护豪强地主利益的。古文学复古和保守的思想倾向有利于维护豪强地主的利益，尽可能避免农民起义和社会变革。白虎观会议表面上看来是学术讨论，实际上是政治决策守成与变

① 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9页。

② 蒙文通认为今学思想以“革命”、“素王”说为中心，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等典章制度为辅助。其基本精神与专制统治是相对立的。今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与君权统治相妥协，改“革命”为“改制”，改“素王”为“王鲁”，今学已经变质。以后的今学家把其制度托于三古，以寄寓其理想。见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孔子讨论文集》（第一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74～135页。

革的抉择。《白虎通义》今古兼采，是“今古之争”折中调和的表现，是皇权直接干预的结果，最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皇权统治。“今古之争”朝着融合今古的方向发展，郑玄通学的出现表明今学已融合于古学之中，今学的革命精神被古学的守成思想所淹没，这就预示着东汉豪强地主左右政局，统治者不可能作出政治上的变革以满足庶族地主的利益需要，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只能是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和贵族地主武装集团之间的连年混战。东汉政权也在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覆没。

（二）晚清的“今古之争”

晚清的“今古之争”肇始于常州学派的刘逢禄。刘逢禄继承庄存与衣钵，治学虽不废考据，但其目的却在以经学资治的“致用”一途，对考据学的琐屑甚为不满，对东汉的古文学也肆意批评。在《春秋公羊释例序》中，刘逢禄批评郑众、贾逵“曲学阿世”，杜预、范宁“吹死灰期复燃”，认为这些都是“异学”。与此相反，他对东汉的何休，清代的惠栋、张惠言进行褒扬，认为他们能守汉师家法，为“善学者”。可见刘逢禄有着明确的学派意识，与乾嘉汉学中严守师法的惠栋一派较为接近，而与不拘守汉儒家法的戴震一派明显不同。基于今文学的立场，刘逢禄怀疑古文学的真实性，他著《左氏春秋考证》，认为《左氏》不传《春秋》，只不过是与《吕氏春秋》、《晏子春秋》一样的史学著作。《左氏春秋》经过刘歆伪造，其中的“君子曰”、“书曰”等均为刘歆所增添。《左氏春秋考证》是疑古思潮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一部著作，它使久已平息了的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风波再起，重新挑起争端，直接导引了晚清的“今古之争”，对民国时的“古史辨”学派也产生重大影响。

继刘逢禄之后，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等也做了一些疑古辨伪的工作，认为一些古文经为伪造。如龚自珍的《大誓答问》、《说中古文》对《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的辨伪，魏源《诗古微》、《书古微》、《董子春秋发微》、《两汉今古文家法考》宣布《毛诗》、

《古文尚书》不可信。这些辨伪已经不纯粹是学术上的争论，而是“以经义讥评时政”，通过对古文经学的批评而进行学术风气和经济、政治上的变革，借今文经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以革故鼎新。这与晚清“自改革运动”的思潮相吻合，为以后的经济、政治变革作了舆论先导。

“今古之争”的全面展开是在廖平、康有为之后。廖平基本上是今文经学的立场。他于1886年刊行《今古学考》，提出“平分今古”的主张。他把今古学的差别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体系之中，认为今古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所讲制度的不同。他认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今’、‘古’两家所根据，又多同出于孔子，于是倡为‘法古’、‘改制’，初年、晚年之说。然后二派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判然两途，不能混合”^①。古学以《周礼》为主，今学以《王制》为主。古学为孔子早年“从周”之学，今学为孔子晚年“改制”之学，今古学的差别不过是孔子早年、晚年思想的侧重点不同罢了。因此，今古学如陆道水路，各有利害，二者应并行而不可偏废。廖平表面上看来对今古学都不偏袒，实际上仍是倾向于今学立场。既然今学为孔子晚年“改制”之学，则今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当然这也同时体现了廖平希望对社会制度进行变革的政治立场。后来廖平著《辟刘篇》（《古学考》的底本）^②与《知圣篇》，就改变了“平分今古”的观点，提出“尊今抑古”的主张。认为《周礼》、《左传》等古文经都有刘歆作伪的迹象，刘歆以前无古学。因此只有今学才能真正代表孔子的思想。“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其中包含了孔子创制立法的微言大义。孔经为万世立法，不仅可以统一中国，而且可以统一全球。孔子不仅是中国圣人，而且是全球教主。受廖平《辟刘篇》与《知圣篇》的影响，康有为著《新学伪

① 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巴蜀书社，1998年，第547页。

② 廖平的《辟刘篇》作于1887年，1894年改订为《古学考》，《辟刘篇》原稿已佚。